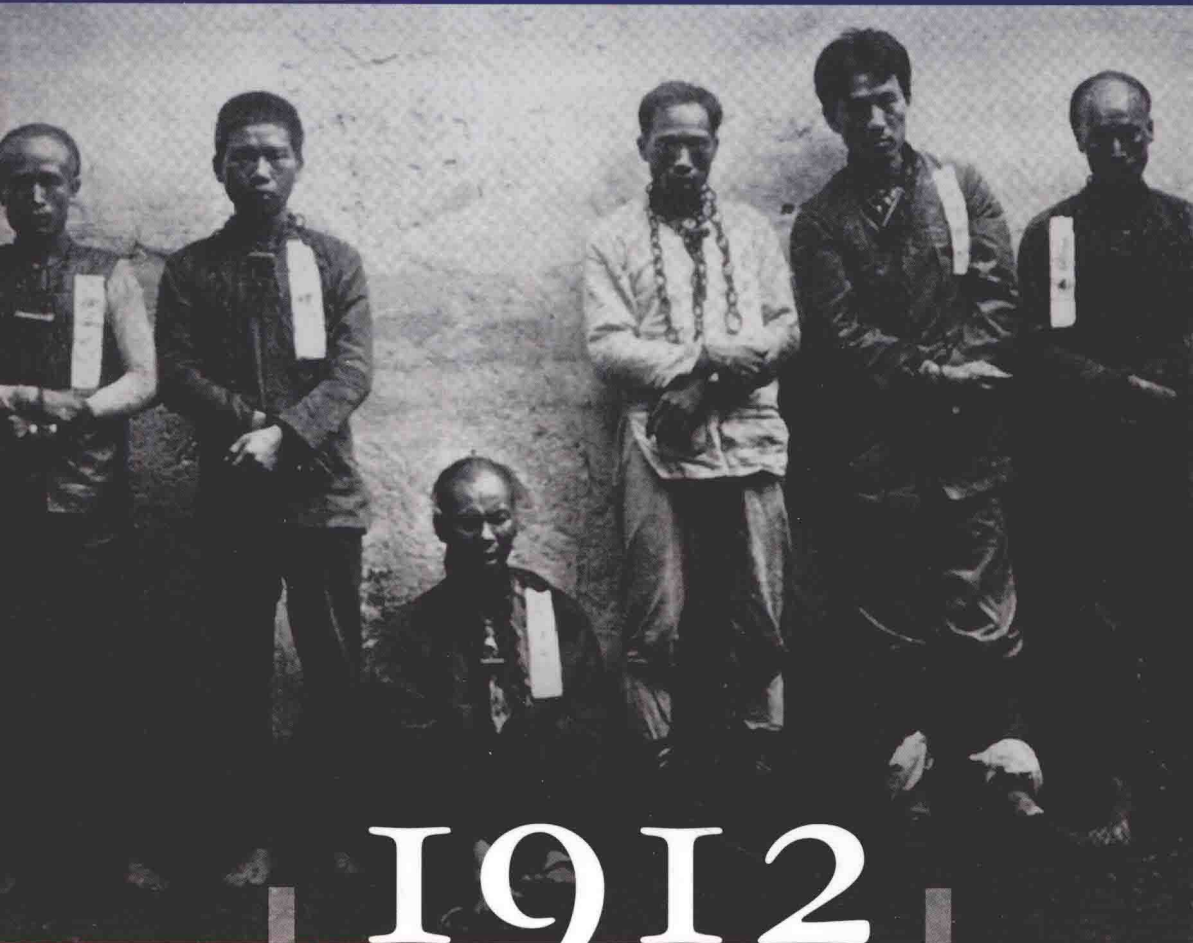


社会变迁与百年转折丛书



「1912」  
年

# 颠沛的共和

沈洁著

中国出版集团  
东方出版中心

社会变迁与百年转折丛书

沈 洁 著

1912  
年

颠沛的共和

中国出版集团

东方出版中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1912年:颠沛的共和/沈洁著. —上海:东方出版中心, 2015.8

ISBN 978-7-5473-0704-5

I. ①1… II. ①沈… III. ①社会变迁-研究-中国-1912 IV. ①K25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94854 号

责任编辑:唐丽芳 丁国生

**1912年:颠沛的共和**

---

出版发行:东方出版中心

地 址:上海市仙霞路 345 号

电 话:62417400

邮政编码:200336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上海贝叶图书有限公司

开 本:700×1000 毫米 1/16

字 数:448 千字

印 张:27.5 插页 2

版 次:2015 年 8 月第 1 版 201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473-0704-5

定 价:78.00 元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窒迫下的近代化

杨国强

历史给我们以知识和事实,也给我们以智慧和意义。与前一面相应的,是对于历史的考辨与叙述,与后一面相应的,是对于历史的理解和诠释,叙述与诠释都是后人反观前代的省视和认知,而正是借助于这种省视和认知,已经过去的人物、史事和过程能够成为时事和时务的一种反照,使后者者在过去与现在的联系之中,从而在过去对现在的衬映之中看得远一点和想得深一点。章太炎在民国初年曾牵引学理以论世相,说是“今人之病根,即在不读史”。就彼时风云际会之中的各色人等一时群起,但大半既不能远,又不能深而言,他的话虽以是写照为评论,而由此划分出来的具有历史认知和没有历史认知之间的全不相同,则显然出自学人的深思。

自“《诗》亡然后《春秋》作”以来,中国文化中始终内含着一种绵延不绝而且磅礴厚积的历史意识,与之相对称的,便是两千年里中国人的自觉于历史认知和执着于历史认知。然而历史的认知又是一种变化的认知,身在兴亡盛衰之间,便是身在时移势迁之中,而后是一代人与另一代人遭逢的世情不同,蒿目的忧患不同,心中的关切不同,面对的缓急之所在不同,有此百端交舛与百端交汇,最终形成的便不能不是思想视野的不同。而引之以入古今之间和由此以识古今之变,则思想视野的不同又常常会化为历史视野的不同,化为一代人与另一代人读史和论史之际的眼界不同,感悟不同,重心不同,取向不同,因此,后一代人常常会在同一段历史里看出前一代人没有看到的联结、因果和意义。而这种历史认知的今时不同往昔,又以其真实的存在和长久的存在,说明了历史需要一遍一遍地写和历史可能一遍一遍地写。若以此观照 19 世纪中叶以来的一百数十年与周秦以来的二千多年,则

一百数十年里的节节丕变所带来的深度搅动，以及在深度搅动里实现的新陈代谢，显然远远过于之前的二千多年，陈寅恪曾概而论之，称为“人世之剧变至异”。比之古代历史，近代历史之“至异”，说的正是近代历史中内含着更多的交错牵结，不可用常度相衡量。与之相因果，这种“至异”同时又决定了对于中国近代历史的认知，不能不是一个穿行于交错牵结和矛盾复杂之中的过程，从而不能不是一个歧异互见而多端纷呈，并且以一种构想校正另一种构想和一种阐说立异于另一种阐说为常态的过程。歧异、多端、校正、立异都各有理据，并因之而各有理路，由此汇积的著述，以可观的数量和种类为规模，显示了数十年之间认知近代历史的功夫和程度。然而歧异、多端、校正、立异之始终存在和相互比照、彼此格义，又说明了数十年之间认知近代历史的多室与多变。积功夫为程度，以及因多室而多变，都显示了视野在移动中的延展和识力在论争中的深化。作为这个过程的产物而继起于这个过程之中，以“社会变迁与百年转折”立名的这套丛书注目于19世纪中叶和20世纪中叶的百年之间，在前贤的论说和时贤的论说之后努力再作回声鼓荡，以表达自己对这一段中国历史的学而知之和困而知之。其中既有读史对于个人的成全和造就，也有个人对于历史的理解和体验。

这套丛书择定七个年份作书名，以此划分100年历史过程中的不同阶段，也以此演示阶段与阶段之间的前后蝉蜕和阶段之间的相互贯连。合蝉蜕与贯连为一体，于是而有“转折”之义。在这些曾经为历史各开一派局面的年份里，1840年因中英鸦片战争而起，1860年因英法联军之役而起，1895年因中日甲午战争而起，1901年因八国联军之合刃构兵而起，1937年因抗日战争而起。就丛书之总体规模作比较，显然是其中的多数与民族战争相为因果，并都因民族战争而各成一局。然则以始末而论，近代中国的历史起点发端于民族战争；以变迁而论，近代中国的新旧嬗递沓浪相逐，而其间一个阶段越过另一个阶段的后来居上，大半也发端于民族战争。民族战争流血流泪，因此百年之间的世路演化和今昔代谢便常常与创巨痛深连在一起。19世纪50年代与60年代之交的英法联军之役致皇帝出逃、京城陷落、圆明园在烟焰涨天里化为一地断砖碎瓦。而后是士大夫“相顾愕眙”，在创痛里直面“二十年之间中国再败于泰西”的事实，由血脉偾张而扼腕沉思。比之40年代人数不多的先觉者因中英鸦片战争而开眼看世界，则此日与扼腕沉思相对映的，已是“当和议之成，无人不为自强之言”。而在历经“夷情叵测，反复靡常，利器精兵，百倍中国”的困厄之后审量彼己，最能感动中国人

和牵动中国人的，是西方人“所以逞其贪纵者，不过恃有长技耳。长技为何？一在战舰之精也，一则机器之利也。然彼有其战具，我非不可以购求；彼有其机巧，我非不可以学习”。时人立此为说以诠释“自强”，则自强之初旨，本在于中国人的办法对付不了西方人之后，转而在用西方人的办法来对付西方人。“购求”和“学习”，说的都是这个意思，因此自强从一开始便与“借法”连在一起。而“购求”和“学习”之倾心倾力于“战具”，以及与“战具”相表里的“机巧”，并由此演为一代士大夫共有的自觉，又说明西方人虽然运来了诸般器物，中国人最先接受和最肯接受的，却只能是重创和打败了自己的船和炮。之后，由船炮催生的借法自强促成了 30 年以洋务为中心的历史过程。然而因自强而借法，则自强在由此入彼和自浅入深之中，借法也在由此入彼和自浅入深之中。两者都出自于古无征，两者都归于了无止境，最终是两者都在改变中国。所以，就其时代内容而言，由船炮催发的借法自强犹如移花接木，同时又因其移花接木而在比较完整的意义上开启了中国社会近代化的历史过程。而 1860 年对百年中国新陈代谢的深度影响，从而 1860 年在百年中国新陈代谢中的意义所在，便同这种民族战争逼扼下的历史因果曲折重重地连成一体。与 1860 年相比，1895 年内含着更剧烈的创巨痛深。但李鸿章和伊藤博文会议《马关条约》之日，于备受困苦磨难的同时又曾非常明白地预言：

此次交战获得两个良好结果，这就是：第一，欧洲陆海军之战术方法，并非应有白人所独有，黄人亦能用之，并证明可以收到实效；第二，日本非常之进步足以使我觉醒。我国长夜之梦，将因贵国的打击而破灭，由此大步进入醒悟之阶段。

作为先入洋务的人物，他亲身经历过英法联军的冲击逼出来的借法自强。因此他相信民族战争能够改变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于是而有割地赔款之际用“我国长夜之梦，将因贵国的打击而破灭，由此大步进入醒悟之阶段”以说来日的推想。他推想更剧烈的创巨痛深一定会逼出更剧烈的社会变迁。而与之相印证的，则是由借法自强，一变而为 1895 年催生的变法自强。从借法自强到变法自强，是移新入旧急迫地转为除旧布新。而后除旧布新越过移新入旧一路翻腾一路播撒，并在戊戌年间演变为与血色相对映的政潮起伏。比之此前 30 年以洋务为中心的历史过程，则这一段新旧交争以思想激

变造成社会震荡，其撼动天下的程度无疑要猛烈得多和深刻得多。之后因庚子之变而有 1901 年，在由此开端的一段历史里，一面是曾经扑杀了变法的朝廷转过身来施新政以行变法，就其下诏筹备立宪而言，实际上已经比戊戌年间的除旧布新走得更远；一面是变法还没有走到尽头，革命已经挟风雨雷电而起，以文字和炸弹岌岌乎召唤共和。随后是朝廷与民间相角牾，立宪与革命相角牾。这个过程既造成了深度的历史变迁，也造成了深度的社会纹裂，两者的彼此牵结和交互振动最终促成了这一段历史在土崩瓦解中走到止境，而两者的余波滔滔则又都灌入了下一段历史之中。若以 19 世纪中叶至 20 世纪前期的这些年份为比照，则 1937 年之所以显目，端在于以这一年为起点的历史过程是一场贯连始终而没有间歇的漫长民族战争。1840 年、1860 年、1895 年、1901 年都与民族战争相对应，但其间的每一场战争又都在时间上无过两年，在空间上止于局部。因此，作为一场血染山河的全面战争和支撑了八年的长期战争，这段历史正以前所未有的战争苦难反衬中国人前所未有的全民抗战，醒目地显示了 20 世纪中国与 19 世纪中国的不同。在这种前后不同的内里和深处，是 19 世纪的世路变迁开始和发生于沿海；搅动和影响于知识人；关注之所在和重心之所在常集于社会上层。而以全民抗战成就八年抗战，则艰难地托起了这个过程和一路维持了这个过程的，不能不是持久的社会动员与社会组织，而持久的社会动员和社会组织，一定又会是深度的社会动员和社会组织。由此牵连拽动而且与之互为因果，开始于 19 世纪的历史变迁遂得以为这种动员和组织所导引，自沿海进入内地；从知识层走向民众；并一步一步移其中心于社会下层。以历史内容而论，显然是动员、组织、牵连拽动以及其间的互为因果，都在使这种支撑民族战争的过程同时又成了大幅度改变中国社会的过程。而当其已经发生，则已经发生的事实便是既定的事实，对于后来的历史，它们既构成起点，也构成前提，而后是起点和前提都不会不影响后来的历史走向。

从 19 世纪中叶到 20 世纪中叶，中国人久苦外力的逼拶，并因之一次又一次地遭逢民族战争，而百年之间中国社会的近代化，以及这种近代化常常与脱跳相伴随的深入，又是在中国人对外力的咄咄逼拶作节节回应里实现的。两者之间的矛盾和依存深相虬结，说明了与欧西近代化之自然地产出于欧西的历史相比，则中国的近代化既是逼出来的，又是移进来的，对于中国本来的历史而言，逼出来和移进来当然都是异常的，从而都是不自然的。而以自然对照不自然，显见得中国人脚下的路会更多盘陀和更加扞格。由于是

逼出来的，因此中国的近代化从一开始便是不自愿的；由于是移进来的，因此中国的近代化从一开始便是夹生的。这种内在于同一个过程之中的悖异，曾使逼出来的近代化和移进来的近代化窒碍重重，并因之而常为“古圣先贤所谓用夏变夷者”对于“用夷变夏”的疑虑和排拒所苦。而后是逼出来的东西与移进来的东西由外入内，便不能不在另一种社会环境里移步走样，与其欧西的原型相比，由此造就的常常是变形和异态。在百年变迁之间，这种变形和异态曾是中国近代化过程里的一个特点。然而中国社会的近代化产生于中国人对西方冲击的回应之中，因此，迫来的民族战争前后相接，在逼出了中国社会的近代化之后，又会以其继起的冲击和不断的冲击逼出中国人在这个过程中的因惶遽而急迫。惶遽化为急迫，于是而有“俄北瞰，英西睽，法南隣，日东眈”之下“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的迫切和“泰西变法三百年而强，日本变法三十年而强，我中国之地大民众，若能变法，三年而立”的企想。在这种由迫切衍生的企想里，富强是主旨所在和重心所在，所以因羡慕富强而羡慕欧西便成为一种捷急的推演。捷急的推演化解了许多移来的夹生和逼迫下的不自愿，然而中国与欧西之间的各自历史文化，以及因各自历史文化而累积以成的异质和异样，则经此统括，也在这种捷急的推演里同时被轻忽地过滤掉了。因此，以泰西“三百年”，日本“三十年”，中国“三年”为类比而作论断，显见得中国之可以与泰西、日本作量比，全在于这一类论断已经设定中国社会与泰西和日本的同质。而沿此一路远走，惶遽急迫与羡慕向往交相感应，都会促成思维在径情直遂中走向简略和简约。当时人喜欢说“思想者事实之母也”，而作为事实与思想对应的，则是从19世纪末期开始而弥漫于20世纪前期的“悚夫欧美革新之隆”，而亟亟乎“规摹仿效”。以为“彼一法一制一俗一惯一条一文，若移而植之我，将旦暮可以强吾国。及为之而不效，则流血拼命以靳之，革无效再革之，再革无效更革之”。其中刻画的“一法一制一俗一惯一条一文”正写照了“规摹仿效”的用心之诚而施力之广。但随后的“为之而不效”以及“无效再革之”和“无效更革之”，又非常对称地写照了这种“规摹仿效”以“移而植之我”的事常常落空和大半落空。“移而植之我”的事常常落空和大半落空，然而“移而植之我”的过程同时是旧物为新物让路的过程，发生于其间的“举一事革一弊，至于风俗习惯之各不相侔者，靡不惟东西之学说是依”，说明外来的东西一路进入中国，在其所到的地方会不断地遇到中国社会里本有的东西与之“各不相侔”，并且因其所到而在一路不停地掀翻这种内生于中国社会



的“各不相侔”。而后，一面是中国人依存于历史文化的精神秩序和社会秩序在“东西之学说”的搅动下不得不走向碎裂；一面是“移而植之我”的“东西之学说”以及与随之俱来的种种法、制、俗、惯、条、文在中国老是“为之而不效”。对于中国人来说，身在两面之间，便是身在两头不到岸之中。因此，时至民国前期，梁启超总括前后而概论之曰：“自二十年来，所谓新学新政者，流行入中国，然而他人所资为兴国之具，在我受之，几无一不为亡国之媒。”20多年来，他曾是为“新学新政者，流行入中国”倾力造因果的人物之一，所以此日言为心声而感慨系之的一派沉痛里，应当不会没有反省和反思。而举“新学新政”为彼时中国人心中的普世之共相，以对比这种普世之共相带给“他人”与“在我”迥然不同的结果，则对比所彰显的，正是中国和欧西、日本之间的殊相。“二十年来”的“规摹仿效”以“靡不惟东西学说是依”为路数，本质上是在营造一个没有殊相的中国。然而沿用这种路数“移而植之我”的“新学新政”，又一次一次地以其“革无效再革之”和“再革无效更革之”，说明了一个没有殊相的地方，共相是既不能进入，也不能安顿的。这种矛盾所反照的困境在于：中国人因惶遽急迫而求富强，因惶遽急迫，既在把欧西变成一种抽象的东西，也在把中国变成一种抽象的东西。之后，“旦暮可以强吾国”犹远不可见，而中国人“积年所希望所梦想”已经一挫再挫“一空无复余”：

惩守旧而谈变法也，而变法之效则既若彼；惩专制而倡立宪也，而立宪之效之既若彼；曰君主为之毒也，君主革矣，而其效不过若彼；曰乱党为之梗矣，乱党平矣，而其效不过若彼。二十年来朝野上下所昌言之新学新政，其结果乃至为全社会所厌倦所疾恶。言练兵耶，而盗贼日益滋，秩序日益扰；言理财耶，而帑藏日益空，破产日益迫；言教育耶，而驯至全国人不复识字；言实业耶，而驯至全国人不复得食。其他百端，则皆若是。

以“变”、“倡”、“革”的凌厉无前与“日益滋”、“日益扰”、“日益空”、“日益迫”的一路直落相对举，两者之间的不能匹配和不能对称是显然可见的。深而探之，则不能匹配和不能对称正显示了前一面的抽象性不敌后一面的具体性；而作为一个历史过程，后面与前一面的相互映照，又醒目地说明了窒迫下的近代化是很容易演化为扭曲的近代化和畸形的近代化的。这种扭曲

和畸形,曾是中国近代化过程中的另一个特点。在数十年世变里,世变所内含的历史变迁由民族战争催生,并且在民族战争的逼扼下节节脱跳地深入和“悚夫欧美革新之隆”地深入,脱跳和“悚夫”都与盲目相伴,因此扭曲的近代化和畸形的近代化便成了数十年之间中国人的一种历史命运。然而扭曲和畸形引发“厌倦”和“疾恶”之日,同时是反思促成认知之日。因此“厌倦”和“疾恶”之后,中国人已越来越多地回头回顾,群集于辨识和论争中国的古代历史,中国的社会性质,中国的社会问题,中国的经济,中国的农村,以及中西文化的异同,等等。从“悚夫欧美革新之隆”到重新阅读和探究中国人的社会、历史、文化,是从抽象回归具体,从而是引共相融入殊相,而后近代化变迁的过程会少一点节节脱跳。中国近代化的盘陀与扞格在此,中国近代历史的路向与路径也在此。

今日学界盛倡新材料、新观点、新题目,而共属“社会变迁与百年转折”的这七本书选择的则都是老题目。就我读史 30 多年的有限阅历而言,新材料、新观点、新题目常能纷纷然各出心裁以动人眼目,然而其中真能耐磨耐久而留得下来的东西其实并不算多。相比而言,老题目则大半是无法绕越的题目,并因之而是不能忘怀的题目。事后论史,19 世纪 40 年代以来的 170 余年之间,一脉传承贯穿前后地把历史连为整体的,始终是中国社会曲折多难的现代化转型。这个过程已经延续了 170 余年,然而这个过程至今仍未了结,因此 170 多年里出现过的困窘、挫折、疑问、争论,都不会是已经远去的東西。后人犹在这个过程之中,是以后人常常要在追溯和回望中求得因果与理解。老题目之无法绕越和无法忘怀,以及老题目之仍须深耕和仍须翻耕,其原因和理由恐怕都在这里。

# 目 录

总序 窒迫下的近代化·····	杨国强	1
-----------------	-----	---

引言·····		1
---------	--	---

## 上篇 抵达共和

第一章 忧、惧之下的逊位与大妥协·····		5
-----------------------	--	---

一 “辛亥之役，必欲逼成共和”·····		9
----------------------	--	---

二 诸王公自革其命·····		13
----------------	--	----

三 “逊位逊给谁?”·····		18
-----------------	--	----

第二章 逃官、节臣与殉清者·····		25
--------------------	--	----

一 “贰臣之多实在今古无两”·····		28
---------------------	--	----

二 时穷见节义·····		38
--------------	--	----

三 “殉”与“不殉”·····		46
-----------------	--	----

第三章 废科举与辛亥革命·····		53
-------------------	--	----

一 军绅政治的开始·····		56
----------------	--	----

二 “学”与“仕”分离·····		58
------------------	--	----

三 由“士”到“国民”·····		61
------------------	--	----

四 “士人社会”的终结·····		67
------------------	--	----

第四章 谣言与谎言：舆论中的共和革命·····		75
-------------------------	--	----

一 有关杀戮的谣言及恐慌·····		77
-------------------	--	----

二 被制造的谣言与谎言·····		84
------------------	--	----

三	以谣言杀人：贵林之死·····	94
四	“清室之亡，实亡于上海”·····	113
<b>第五章</b>	<b>杀戮：并不共和的“五族共和”</b> ·····	127
一	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并行·····	130
二	从“天讨”到革命·····	137
三	“满洲人或无死所矣”·····	145

## 下篇 共和以后

<b>第六章</b>	<b>共和的变质</b> ·····	169
一	“雅各宾主义的中国”·····	172
二	“咸与维新”·····	190
三	“无分南北”，“不是东西”·····	204
四	北洋的分裂与覆灭·····	226
<b>第七章</b>	<b>再造共和</b> ·····	239
一	被挟持的袁世凯·····	243
二	“天祸中国，元首谋逆”·····	263
三	自治传统与联治运动·····	281
<b>第八章</b>	<b>“民国乃敌国也”</b> ·····	299
一	紫禁城的黄昏·····	301
二	大昌孔子之教·····	320
三	后科举时代的功名意识·····	332
四	遗老：帝国缅想·····	343
五	流亡的旗人·····	356
<b>第九章</b>	<b>“再造文明”</b> ·····	379
一	“迷乱的人心”·····	381
二	眼光向下的新文化·····	395
三	国学与救国·····	405
<b>第十章</b>	<b>结语：“民国的失传”</b> ·····	415

## 引言

讲述 1912 年,我想从它的终结处开首。郭沫若自传《北伐途次》中讲了一次经历,一则有关“国旗”与“党旗”的故事。1926 年 10 月北伐军开进武昌城,郭沫若随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驻扎在旧省议会,驻定之后,就在屋顶正中的旗杆上挂上了国旗。过了一个礼拜,湖北省党部也从汉口搬来这里,甫一进来,头一件事当然是要升挂党旗。在要升旗的那一天,他们要求政治部把国旗降下来,换上党旗。于是乎,有了政治部与党部的下级人员一番争执,都不肯退让。很快,省党部来说“一切权力属于党”、“党部是在一切政治机关之上”、“党部是革命力量的中心,我们应该拥护革命的中心力量”,等等,对政治部的人大发议论,依旧要求换旗。郭沫若时任宣传科长兼行营秘书长,与他们据理力争,理据是:“国旗已经升上了,不好无故地扯下。要说省党部是党部,是在一切政治机关之上,但是总政治部在出发时受了中央党部的委托,是有指导并解散地方党部的权限的。”并嘲讽党部来使,是路易十四的新翻译家,把路易的“朕即国家”改成了“我便是党”。争执的结果,国旗没有扯下来,另在屋子前庭树了一根旗杆,把国民党的党旗挂上去了。郭沫若记述说,这件事情想起来无聊,“但那时的革命同志们大多数也每每爱闹着这样无聊的意气。三分来是革命,七分来是做官”。事情的确是极细琐的小事,记述者也自陈“无聊”,但数十年后仍觉“奇妙”,而且“记得异常鲜明”。

以后来的历史回看这则小风波,我们知道,“意气”并不仅仅是意气,它几乎表述了北伐以后数十年,中国政治的一种基本面貌。翻出这则小故事,让人觉得,“党”与“国”成为争执的两端,国民大革命以这样的方式来揭幕,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日后历史的纷争和走向。当军阀统治已成溃决之势,因“打倒军阀”而结成的联盟却隔阂蹇拙,党与党之间,党内的派与派之间,党治与政治之间,矛盾重重,使得同盟者在结盟当日已经面临解散的危

险。这与辛亥、壬子之际的中国历史，似乎惊人相似，南北议和、大妥协与清帝退位，中国历史迎来了一场千年转折。但以妥协而揭幕的这个开端，也决定了中华民国起头数十年的乱局。由军阀而政党，由“旧邦新造”而“再造共和”而“国民革命”，这些转折究竟是怎么发生的？

从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到1927年4月18日南京国民政府成立，这十多年的时间，在我看来，都可称为辛亥革命及其继续。1912年清帝逊位，由妥协而达成的共和远不是革命的结束，却意味着一种开始。在这场大妥协中出场的各色人等，正式揭开了中国革命的序幕，而此后他们之间的抢夺与征战也才真正奠定了中国革命的未来。1912年，旧邦新造，造的是一个舞台，在这个舞台上活跃表演的还是旧邦（帝政时代）的各色实力派人物，从武人、绅士到形形色色的政客、党人，自晚清始，他们之间就有着复杂多变的关系，民国的历次政争也不过是这些关系的延续。一直到北伐，到南京国民政府成立，新的军、政人物掌握权力，辛亥革命或许才真正结束。中国，开始了党治国家的历程，进入到新的历史阶段。

唐德刚曾说，“鞑虏易驱，共和难建”。这也是我们印象中北洋的民国：螭螭沸羹，事实章章，不可掩蔽。从1911年到1926年，中国的政治与文化在缔造共和的过程里沿途劫难，党人、武人、文人与政客，轮番登场，却在“法”与“统”、“法”与“道”之间一再迷失，直到新主义、新势力的出现。所有这些参与缔造民国最初政治秩序的人们，试图用武力去征服法统，又试图用传统去确立现代，他们的观念都是混杂、不确定的。这充满了诡谬的历史，正是我想要讲述的——一些拖曳着中国从革命走向共和的因素，一些新时代里的旧东西。在这个框架里思考民初中国，我想，以往种种不可理解的“倒行逆施”、“荒诞不经”或许可以得到一点解释。

## 上篇 抵达共和

1793年，英国人马戛尔尼眼中的乾隆盛世，是繁荣却充满危机的，他在日记中写道：“中华帝国是一艘陈旧而又古怪的一流战舰，在过去的一百五十年中，代代相继的能干而警觉的官员设法使它飘浮着，并凭借其庞大与外观而使四邻畏惧。但当一位才不敷用的人掌舵领航时，它便失去了纪律与安全。它可能不会立即沉没，它可能会像残舸一样飘流旬日，然后在海岸上粉身碎骨，但却无法在其破旧的基础上重建起来。”<sup>①</sup>犹如谶语，一百多年后，清朝真在一位“才不敷用”的摄政王领航下轰然倒塌了。

晚清的最后十年：拳祸方息，满汉之见哄于朝，文字之狱兴于下。内地之秘密会党，蔓延日甚；外人之权利要求，贪得无厌。日俄之兵，战于满洲之野；西藏腹地，又为英兵阑入。数十万之青年学子，犹复麇聚省会，于风檐寸晷中竞一日之短长。茫茫禹域之中，几索然无复生气。<sup>②</sup>国势颠危，民情锢蔽。正像马戛尔尼所言，像残舸一样飘流。百年而后的百年，再读马戛尔尼的话，令人惊异的并不是这预言的准确，却在于，清国祚二百六十七年，数月之内堤防溃决。彼时的中国，一面是民军、新党、顺时势者在欢呼共和，“为中国开亿万年进化之新基，为祖宗留二百载不刊之遗爱”，“比诸尧舜，抑又过之”；一面却是孤臣孽子悲恸于“人心尽去”、“宗社沦胥”、“闻之心如刀刺无过”。辛壬之际的这一场革命对于中国历史而言，真正映照了一种“天崩地坼”。而与这种“天崩地坼”对应的，却是旧制度的守护者宣称“予亦何忍因一姓之尊荣，拂兆民之好恶”的深明大义。相比历代鼎革和世界革命史上“涂肝脑、迸血肉”的惨烈，辛亥革命似乎更有理由称之为“光荣革命”。需要想象的是，革命以“驱逐鞑虏”揭幕，却以“五族共和”收场。由矛盾、对

<sup>①</sup> 参见徐中约：《中国近代史：1600—2000 中国的奋斗》，计秋枫、朱庆葆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08 年版，第 128 页。

<sup>②</sup> 杜亚泉等：《辛亥前十年中国政治通览》，中华书局 2012 年版，第 1 页。

峙到最后的妥协，这么大跨度的变化究竟是怎样达成的？逊位的朝廷与共和的民国又是怎么相处共存？结局如何？在这一段以“共和”为中心的历史过程里，帝室的抵抗和妥协成为中国现代转型的关节点，从中折射出的人、世、因、果是“革命史”上更为深刻的历史内容。



第一章

忧、惧之下的逊位与大妥协



幼年的溥仪